

周思聪与友人书

周思聪

文稿

寄呈审阅(3月)收到的，两小时内我
翻阅一遍，开始生冷。我们都懂得这
所以被你理解她的电子烟带得离
最近往后的还是人的如画衣服。人是
多懦弱，又是多坚强。那么容易被
教，又是那么难以被束缚。卢沉经年趁
麦时，曾经见过他去拉煤的情形，他
当他的车组的壮劳力，时常派上高而陡
坡，那么沉重的煤车，沉甸的陡坡，
平时真是训练得像他能应付得了，每
当他精疲力竭倒在路上时，第一个想
就是一个人，一个有知识的人，像杨柳一
没有价值、渺小。他的一个学生，师德
已是两肺空洞，还需要继续，第一次就
经不住寂寞苦楚，当晚死在他身边
(他为她同睡一个土坑)。推而扩之，一个
人多细着想吗？包括他的双亲在内？
而想又怎样？只寄付那寂寞的心更
加疼痛而已。

本书收录周思聪致友人信一百四十二封，时间从1980年到1992年，大体涵盖了周思聪艺术思维和创作最活跃的时期，其中包含的信息量是可想而知的。

这一时间段，恰是国家转型的初期。新旧交替，激烈多变，时而风雨时而晴。信中涉及的大小事件皆是社会全景图之一隅，清晰映现出时代变迁的印迹。

敏锐犀利的见解，桀骜挺拔的风骨，凸显出一代艺术创新者的品格风采。一切价值，惟在真实。

ISBN 7-5347-4392-3



9 787534 743924 >

ISBN 7-5347-4392-3/K · 191

定价：19.00 元

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周思聪与友人书
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思聪与友人书/周思聪著;马文蔚编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6.11
(大象人物书简文丛/李辉主编)

ISBN 7 - 5347 - 4392 - 3

I . 周... II . ①周... ②马... III . 周思聪(1939 ~ 1996) —书信集
IV . K825. 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2251 号

周思聪与友人书/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编 者 马文蔚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责任编辑 佳 言

责任校对 石海琴 吴春霞

装帧设计 王翠云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行科 0371 -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- 63863572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40 × 960 1/16

印 张 10.5

字 数 129 千字

定 价 19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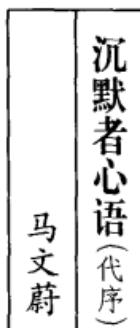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(0371)65957860 - 351

周思聪小传



周思聪（1939—1996），女，当代国画家。生于河北宁河，长于北京。八十年代起，着力于水墨画的创新。以力作《人民和总理》、《矿工组画》闻名于世，《彝女》、《墨荷》系列为成就之最。出版有多种画集。1981年起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



好友周思聪五十七岁早逝，留给我的痛苦和愧疚是无法言说的。她离去已有九年，这种感觉依旧存在。头几年简直不敢碰触，退休以后，才静下心来一字一句重读她的信件，和当时相比，感受竟大不相同。

这些文字写于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，其真诚、直率，以及内中包含的人格力量、犀利的见解，经过岁月的淘洗，非但没有褪色，反而更加光鲜；尤其是对阻碍社会进步、制约艺术发展的意识形态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顽固积习，她反应敏锐，恶之尤深。似乎她“醒”得比别人早，头脑多一些准备。她在艺术实践中不计成败、以变求生的愿望，是那样强烈。当时很熟悉的文字，不知怎么的有些生疏，像是第一次看到，又仿佛有种冲击力阵阵袭来。

这都是我们的“私房话”，没给别人看过。1996 年出版她的纪念文集时，考虑到她遗留的文字有限，从中选了一小部分，交给她丈夫卢沉。后来同她的笔记、发言提纲等归在一类，略起到补充作用。而多数很有价值的文字，仍积存在我这里。人渐渐地老去，不免有一天它们随我的遗物一起化灰成烟，那就埋没了她，毁灭了她赋予这些文字的美好生命。思之再三，不如展现给世人，让它们重获生机。这对怀念她、喜爱她艺术的人，对研究者，都会是有益的。

回想和周思聪的相识，“开篇”平平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去找她目的

单一，就是为采访。1979年底，她的《人民和总理》在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中获得一等奖；那时我在北京广播电台首都生活组，对一等奖的作者当然不想漏掉。并不像她最初猜想的那样，除了采访另有交往的意图。

第一次见面是在画院。我的初中同学郑培蒂（此时在北大任教），是周思聪的高中（师大女附中）同学，她很高兴作引荐人，约好春节周思聪值班时见面。记得那是初二，头一两天下了大雪，路面全是纵横交错的冰辙印。我们骑车从大西头到东城沙井胡同，一路颠滑，险情不断。好不容易安全到达，没来及谈正题，就被一群找她聚会的女附中老同学搅和了。她们是约好的，我事先一无所知，心里多少有些怨气。这就是后来她信里说到的：那天我们都很高兴，“只有文蔚不称心”。临别时约定初三到她家里去谈。

白塔寺东廊下我很熟悉。在女三中的六年里，我经常从北沟沿（赵登禹路）穿小胡同回家，路过多次。想不到她家三代五口，就住在一个毫无格局的大杂院、两间阴冷的小平房里。她把我带到一间主人外出暂时空下的简陋小屋。单独面对时，她脸色微沉，不主动开口，回答也很简练；中音的嗓子略带沙声，像滞涩的逆笔，沉稳而有力。说到《人民和总理》这幅画，对于得奖似不愿多说。最感动她的，是重访邢台地震灾区时，农民对周总理的怀念。“撕心裂肺的哭诉，我永远不能忘记。”她细数画中几个人物的原型，讲他们的真实故事。还说到总理的形象多么“入画”。她此时画总理，是经受社会动荡、痛苦反思之后，一次严肃、深情的选择。

谈到造型，她说不喜欢甜俗的形象。她有一枚印章：“羞学流莺百啭”，摘自一首宋词。这不经意的表白吸引着我，简直比看到那幅得奖力作还要兴奋。“甜俗”！我眼前闪过很多画面，成为“作品”邀宠的，流行于现实生活中的……

为这篇报道，又见过几次，在雨儿胡同画室，在藻鉴堂对面的土坡上。她身材高挑、匀称，相貌端正，穿着家常，总的说很顺眼，倒没觉得有多美。偶尔还怯生生的，甚至有点笨拙。在画室、画案前，就不一样了。一双手大而有力，仿佛专门为握笔而生。嘴唇紧闭，目光自信，动作协调潇洒，有一种

沉静倔强的美。画得专注时，忘了身边还有人。稿子播出以后，对她来说，我就不再是“记者”了。我不想再报道什么，她也十分相信这一点。

也许是同龄人，有很多共同的话题；也许在说话“没遮拦”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，不知不觉交流日益增多。没时间见面，就笔谈；开头的信较短，相隔时间较长。估计1980年一年的信因为工作变动、搬家等丢失了。80年代中后期，她的病渐重，握笔困难，写信渐少渐短。90年代起，手指严重变形，写字疼得钻心，慢慢地停笔了。我的信都是随手写来，不值一留，所以多次对她说不要有留的念头。可她的信不一样，写得认真，写得艰难，文好字也极美，对我来说，篇篇都是艺术品，实在舍不得毁掉。就以各种理由说服自己“刀下留人”，多留一时是一时。终于，它们侥幸活到今天。

一开始她就说“淡如水”。希望像水一样纯净、透澈、交融无碍。跟她交往的十多年，是她名声初起到负有盛名的一段。但我始终没觉得她有“名人”习气。她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，生活中负担重、烦恼多，急了也想哭想骂人。迫于压力，也得有“另一本账”——画“应酬画”或“画些银两”。她有时会写错字、读错音，在专业范围以外，也会显出可爱的无知和无能。一次培蒂请我们看剧。培蒂向来礼数周全，散场分手时对思聪说：“谢谢你来。”思聪愣了一下，问“那我说什么呢？”培蒂教她：“你说‘谢谢你的邀请’。”她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，然后憨憨地笑了。而最令我惊奇和感动的，是她主动自曝缺点；这是一般人初交时难以做到的。她认为对朋友如不能直言，是一种遗憾。她批评“我们的”记者的恶劣习气时，从不避开我，还特意点明“干你们这一行的”。我当然不会生气，我已是伤痕累累，能说没有体会？但远不如她看得尖锐、深刻。如我对她稍有不解或不满，又不愿直说，她会生气：“下次你给我指出来。”对艺术创作，她同样真诚。她羡慕孩子，说他们“没有要讨人喜欢或怕人耻笑的种种顾虑，一心一意地表达自己的感情。它真挚，就必然可爱”。她讨厌甜俗，就是厌恶迎合、媚俗、粉饰、拔高；就是鄙弃虚假，维护真诚。

有时候我也紧张，因为她话太少。一次，听关牧村独唱音乐会。电台发

的票多，我约她和卢沉同去，告诉她她在体育馆。她很高兴，问：“方的，还是圆的？”方的，首都体育馆。虽然从光华路到首体，坐公交车很慢，“赶上去趟天津了”，他们还是提前到场。开场前和中场休息，两段时间都不算短，他们俩不走动，就在座位上呆坐着，不说话。我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一时没了主意。又不好和周围的同事搭话，把他们晾在一边，真是别扭极了。过后我问起这事，她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说自己生来话少，画画的人习惯用眼睛不用嘴，“笔不到意到”；不像你们记者主要用嘴。类似情况不止一次，她也着实因此吃了亏。为装扮北京台建外新址，两位男记者曾到她家求画。她认定和我有关，很痛快地答应了，认认真真画了一幅四尺大画。在酬谢宴会上，她没见到熟人，才隐约觉得不对。事后写信告诉我，我不知说什么好，真的很心疼她。她负担太重，欠“债”成堆，自己的创作只能一拖再拖，我全知道，所以从不忍心跟她要画。倘若是我，一定当面说，不会悄悄躲在背后。她为什么不问我？只需一句话。她不说，她习惯沉默。

她的沉默，当然也有另一种含义。她能细心体察身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陷入窘境的裱画师傅，生计艰难的学生等等；不用对方开口，必会倾力相助。对他们就像对自己，该做就做了，何须言语！直到人们痛悼她的去世，这些事才被公开。

沉默，使她更充分地“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”。多思、内省，铸成了她聪慧、深沉的性格，这是成就一位艺术家必不可少的资质。

沉默，也使她的所思所想没有随风飘逝，它们凝聚在这些可触摸的信纸上，可阅读的文字里，可欣赏的笔触字迹之间，这是她留下的最真实最可贵的心语。

其实对于她，我不是理想的交流对象，我们之间不对等。近年来想到自己，以及与自己类似的人，觉得就像廖冰兄的漫画“坛中人”。即使坛子被打碎，人也舒展不开了。精神的缺残，无影无形，难于补救。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认识，我自知肤浅。对她热衷的绘画艺术，我虽然从小喜爱，也只是业余又业余的水平。我对她说，看一篇文章，我大致能判断它属于哪等哪

类；看一幅画，我不行。她说：“看感觉。”也就是一幅画给人的视觉感受吧。可每个人内心依据都不同，“感觉”也必是千差万别的。幸好她对我这业余“幼儿园”不嫌弃，一有画展就约我同去。虽然她朋友、学生很多，常常被前呼后拥而顾不上我，我也感到幸运，毕竟能听到高手讲解，非同一般。在她能自由行走的那些年，有习作观摩、画展我都尽量去；美术馆是去得最多的。她去世以后，看了回顾展——她在美术馆唯一的一次“个展”。1996年10月7日，一个阴凉的雨天。那些再熟悉不过的画悬在壁上，面对虔敬的人群，却和创造它们生命的人永诀了。两个月后，又去美术馆看了卢沉和几位江苏书画家的作品展，就再没去过，直到八年以后（2004年，法国印象派画展）。那里留下太多往日的声音和印迹，那里是我的伤心地。

《人民和总理》的酝酿和画成是在70年代末期，一个时代转换的关口。时代是人生的宿命，她的画史也恰恰印证着时代的变迁。她前期的作品多是领袖人物、历史人物，或是反映新建设、新气象等“大好形势”的，很“正面”。和其他同类画相比，选材雷同，差别有限。明显能看出当时奉行的文艺理论和政策，对题材多样性、主题纵深化的限制和扼杀。《长白青松》是1973年的作品，曾受到画界的好评。画面看上去喜气洋洋。两位“兵团战士”健康茁壮，手捧油绿的松苗，献给母校尊敬的师长。主题积极，充满对少年学子下放锻炼的肯定和赞扬。谁能想到，画家是纪念在北大荒救火牺牲的青年（画家潘絮兹的女儿）呢？谁能破解她的曲笔？说画家以“青松”比喻牺牲者，并让主角“复活”归来，是理想主义的体现和升华，似乎也说得过去，又觉得勉强。“文革”已进入第七个年头，一位多思的中年画家，“批判”必是多于“企盼”的。绘画是直观的艺术，作者要说的尽在其中。如果画面看不出来，要靠知情者讲述幕后故事来点睛，总是差点劲，难说是成功的吧。那年月，画家只能在“想画”和“能画”之间艰难地徘徊，寻求一个交汇点。她说过：“人物画应当记录时代。”“现在，人们都拿古人搪塞了。”“人物画不能反映现实，不如去画山水。”从她的话里，可以看出以人物画安身立命的她，曾是多么矛盾和苦闷。

《人民和总理》以后，渐渐发生变化。贯穿《矿工图》创作的一个长过程，是题材放开、主题深化，同时要求创作手法随之丰富的过程。“矿工组画”酝酿较早，是“文革”期间大搞村史、厂史的时候。她和卢沉共同策划，是想表现矿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苦难遭遇：“背井离乡”、“地狱之门”等等，直到“当家作主”，翻身解放。自己也觉得不够深。经历了“文革”，对人生的认识不断深化，这一主题也相应改变。以矿工群体喻示全民族；从历史的、过去时的，延伸到更大时空范围；从经济、政治诉求，深入到对人性的思考、人道的关怀。在一次次巨大灾难面前，由任人宰割、痛苦挣扎、奋起反抗，最终醒悟到不靠神仙皇帝，只有自己救自己，走向身心自由的新天地。布局庞大，寓意深刻，用传统的手法无能为力，必须有所突破。

周思聰说，她的习作“都是些悲苦的形象”。这当然和创作的要求有关，但她对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关注是一贯的，发自内心的。这一点常使我惊异。每次外出，下煤矿、去农村、走彝寨，像回家一样亲切、兴奋。来信里，对当地民情都有详细描述。千年不变的耕作方法，恶劣的生活环境，难以想象的穷苦，近乎麻木的神情，令她震惊。夭亡的彝族女孩阿芝；胡同里拄拐的瘦弱男孩；活一天算一天的矿工；肮脏破烂、一心要讨个说法的上访者……他们的命运牵动着她的感情。说她继承了伟大艺术家珂勒惠支、赤松俊子的博大胸怀，得了恩师蒋兆和的真传，可以；说这是她与生俱来的“平民”、“草根”情怀，似乎更贴切。她与他们息息相通，爱他们如父母兄弟。从他们身上，她看到自然、平凡的大气象，一种真美。

和《矿工图》的习作差不多同时，或稍早一点，她就尝试变形了。她要从“穷途末路”的绝境中闯出一条路来。“严格写实”这一种“语言”，已不够用。她说，变形是一种夸张。按我的理解，夸张是为了强调。和写诗、作文一样，一旦有新的领悟，要提示出某种思想，必须打破常规的叙述方法。旧词不够用，还可以造新的；统统是用来强调，营造不同寻常的气氛，让读者警觉、领会。变形，就是绘画语言的一种强调，用来突出画家的新感悟。

她的大胆尝试引发了激烈的讨论。沉寂得太多了，多少人渴望着“变”。

是“美”是“丑”，是“进步”还是“倒退”，争论各方都语出真诚。那一阵子，她非常兴奋，将自己比作“步履蹒跚的初学者”，“宁可画不出一幅画”，“宁可作品被枪毙”，也决不回头。她中年“变法”的勇气使很多人感动。后来我读到李可染先生的书，他说：“怕失败是没有出息的。”“往往从不失败的人，最后是彻底失败的人。”他的体验，道出了创新者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。

初看她变形的习作和小插图，不大习惯。和原来相比，好像没那么美。慢慢地看出些味道，觉得很耐看，有咀嚼的余地。以前是摆在明面上、人人可见的寻常美、通俗美；变形的过程，就是画家把未必人人能见的独特美、深层美发掘出来，呈现在你面前，“震”你一下。画家在向你诉说仅属于她自己的感悟——从别人那里你是听不到的！品出一丝微妙之后，再回头看以前的一些画，有点不疼不痒。好也还好，好得一般了。《矿工图》开始，她的创作渐渐摆脱一般化，显现出个性、多样和丰厚。画面给人巨大的视觉冲击力。《矿工图》计划庞大，每一幅都是重头戏。她身心疲惫，自感“力度不够”，只画完四幅，成了“未完成”的巨作。画评家说，它是继蒋兆和《流民图》之后，表现民族性苦难的重要作品。在笔墨运用上，是中国水墨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而她说自己“只迈出小小的第一步”。

“彝女”系列和“墨荷”系列，是她的第三高度。从时间上说，“彝女”开始较早，从80年代前期延续到90年代。她说，画彝女是表现自己。这说法得到认同，于是人们很直观地联想到她的“重负”、“悲愁”和“忧郁”。其实所有艺术作品，都离不开作者自己。我觉得她这时的“自己”，更有一种融入自然和天道的向往：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；无浮华梦幻，无贵贱尊卑；与山林鸟兽同生共死，那样一种平凡、壮阔、宁静的人生。因而，她把她们的劳作，淡漠的表情，日复一日印在山路的脚印，看作是无声的“诗”。她的两句铭言：“我爱静谧的大自然”，“我爱平凡的人”——看似两件不相干的事，原来是紧密相连的一体。

渐渐地，又有了变化。再后来的“墨荷”，表现出“淡”的倾向和情趣，这和她的境遇相关，病的“不治”，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她的类风湿，经西医、中

医治过多年，连气功都试了，顶多暂时缓解，治愈无望，索性放弃，听其自然。不能自由行走，外界与她无缘了，只得将一切外骛之心收回来，一切执著全都放下。“放到无可放处，淡性自然现前。”（晋代高僧蕡益语）那是一种无欲无求，平和、淡定的心态。到这时，反而有了更多的发现，更奇妙的感悟。“淡”的背后，不是虚空，而是丰富，是“一花一世界”的体验和境界。

后期的“彝女”及“荷花”系列，背景更广袤、朦胧。“淡”到不再能看出地域场景，也不须有故事和情节；似不经意的形色点染，传达出一种气氛和情绪，构成浑然一体、无以名状的意境。就像欣赏音乐和文学作品，它可以直接拨动我们的心弦，引起共鸣，而不依赖于对时代、国度、作者的分析。面对这些画，我们会莫名其妙地被感动，被溶解，被净化。它们的品格、境界，此时已完全进入我们的心灵。

深感遗憾的是，在她生前，我没有认认真真读她的新作，也没有正经向她求教。我总是忙得不由自主，没有听从她的提醒，留给自己一点喘息、思考的时间。她想听到各方的反应，想得到朋友们的支持，我却没有给她多少。也总有些毁谤杂音从角角落落散布出来，搅乱她的安宁。我不知怎样才能安慰她，往往无言以对。她让我做的事，我大都没有完成。她在兰州病倒，右臂插着输液管，还用左手握铅笔，在软沓沓的卫生纸上写信给我们；而她住进并不遥远的小汤山疗养院，寂寞得观看窗外叽喳蹦跳的小鸟，看它们左顾右盼的美丽的小脑壳……近两个月，我没去看她一次。特别是她手指变形，难以动笔，我似乎也只是打电话，不大写信，约有三四年之久。有时是心情不好，有时是想索性忙完再去看她。1995年末，收到她亲手画的贺年卡，赶去看她。她的头脸已明显变样。问我“收到了吗”？眼神里含着期待。我说：“收到了，画得那么好。”她笑了：“我也没想到能画那么好。”原来是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笔画的，画了十几张，分送友人。二十多天后，她离开了人世。生命到最后阶段，还想到给朋友们送去最美的祝愿。为什么我就想不到分分秒秒受病痛折磨的她，不能出行不能写信没有治愈希望的她，需要真诚的交流和更多的安慰呢！她总是默默忍受，顶多夜里一个人“哭鼻子”。据卢沉说，

出事的那一晚，她也只是从床上爬起来，弯腰忍痛，不想惊动家里人。多年来，她的忍耐力是常人想象不到的。回想这一切，我无法原谅自己，我深感愧疚。

我曾约见思聪的哥哥周思敬先生。他也和我一样，没有思聪的画。他说：“我们俩自小到大没红过脸。她命苦，没过过什么好日子。感觉她不会长寿，没想到走得这么早。”卢沉肝不好，是家里的保护重点。突然失去思聪，仿佛失重，更沉默了。他带我去八宝山公墓，地铁车厢里，他悲戚无主的样子，至今仍在眼前。后来他得了肺癌，又不治去世。告别仪式恰巧也在寒风凛冽的一月。白色挽幛在风中狂抖，噼啪作响。时隔八年，景象重现，深感世事无常。曾活跃在我们身边、无比真切的友人，就这样走进历史。

很多回忆和纪念她的文章发自肺腑。郁风先生有一句话，惊人地好：“憎恶一切丑恶劣行，蔑视一切浮华虚名，在违背正义良心的大事情上即使众人皆然她也决不低头。”这正是周思聪不同凡响的品格特点。读她留下的这些信，能得到相应的印证。

走进历史的国画家周思聪，终究是一位凡人——归于她所爱的平凡人之列。她不长的一生，留下负重疾行、孜孜追求的精神形象。一步步从麻木走向清醒，从禁锢寻求突破，从贫瘠渐入丰富……转型的时代，与渴望变革的画家，相因相长，走出一条既独特又具代表性的路。她的创新得到了当代同行的关注和高度肯定；还将不断经受后人严格审视的目光。她一生的对与错，幸与不幸，满意与缺憾，所谓“灵魂审判”，只能由自己做出，而与他人无涉。对于我，能成为她信任的朋友，交流的伙伴，是今生的幸运。我会珍惜，会从中吸取养分，受用终生。

她挺拔、昂扬的精神躯体，孩子般的赤诚，压不垮的倔强，在我心里长存不息。

马文蔚敬笔

2005 年岁末

编者说明

周思聪与我通信十多年，除不经意中丢失外，现存信件 144 封。删去两封无甚内容的短信，本书实收 142 封。考虑到公开出版的要求，及家人意见等，作了少量删节。原则是只删不改，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貌。另对文中错讹、笔误之处作了订正；加了简单的注解。

符号使用：“◆”表序号；“……”表段落、句子删节；“×”表隐去姓名；（ ）为写信人自注；[] 为收信人和出版者——统称“编者”——订正及注解；文中“的”、“地”、“得”混用较多，为阅读顺畅，不再一一加注。

因多数信封丢失，有些信件年份不易确定。凡此种情况，年号后加“？”；请读者原谅。

目
录

- 001/沉默者心语(代序)——马文蔚
010/编者说明
- 001/一九八〇年(一封)
002/一九八一年(二十四封)
026/一九八二年(四十封)
077/一九八三年(三十一封)
107/一九八四年(九封)
115/一九八五年(七封)
120/一九八六年(九封)
129/一九八七年(十三封)
140/一九八八年(五封)
144/一九八九年(一封)
146/一九九一年(一封)
147/一九九二年(一封)
- 148/后记



◆1

文蔚好友：

我已搬入新居，你有时间一定来玩。从你那里乘一路汽车到大北窑下车就到了。地址是：三环路三号楼三门302号，就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对面，极好找。我除星期二例会之外，平时基本在家画画。

前些天郑培蒂请我看戏，那时我还未搬家，请你转告她一声，我就不另写信了。你们什么时候来，先给我个信，我等你们。最好乘公共汽车，骑车太远了。

这回我们可以有个地方好好叙谈了。

祝好

思聪 11,23 [1980]

南北画院联展你看了吗？希望听听你的见解。

来信暂寄画院，因三环路尚未设邮政点。我去画院开会时必能见到你们的信。